

（二〇二〇年二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四十年前的记忆断章	北 岛
【动乱时代】	我所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郭小宁
【史海钩沉】	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	汪东林
【人物追踪】	寻找回来的精神	范文发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四十年前的记忆断章

• 北 岛 •

0 1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0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招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 / 告别母爱的港口 / 要向人生索取 / 不向命运乞求 / 红旗就是船帆 / 太阳就是舵手 / 请把我的话儿 / 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朗朗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

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0 2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0 3

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十八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

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 / 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 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04

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销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班了，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05

1975年2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泥板照例咣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钣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14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艳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了“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0 7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

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9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漳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3点42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0 9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书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 / 告别母爱的港口 / 要向人生索取 / 不向命运乞求 / 红旗就是船帆 / 太阳就是舵手 / 请把我的话儿 / 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 来源：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 ，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

## 【动乱时代】

### 我所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郭小宁 •

#### 一、文革爆发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官方定义是从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这段时间，也称作“十年文革”。我这里写的文革，仅仅只写从1966年6月到1968年3月这短短一年半左右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谈文革重点只谈这一年半左右的事情，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文革开始不久，就把各级领导机构都打倒了，全国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一段时间；第二，这段时间也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从满怀热情全身投入到消沉无聊沦为旁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我对文革的基本认识。这以后，从1968年参军到后来退伍参加工作一直到1976年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宣布文革结束的八年多的时间里，就完全是按组织的布置安排来参加运动，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思考，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到文革后期对这场运动开始产生怀疑甚至抵触反感。所

以对我来说，作为初中学生参加的文革经历及思想变化，是最有价值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认为最值得书写的一段经历。

1966年6月，初三毕业考试已完毕。就在我们升学志愿已填好，准备中考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所有的升学考试全部暂停，正常的上课也停止了，师生们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就开展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猛烈批判，在国内则首先从彭德怀开刀，狠批“右倾机会主义”，作为造舆论的文学艺术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批判运动也如火如荼，国内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到1965年，毛泽东更直接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冬，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央报刊上发表。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看来，国内的阶级敌人已经在蠢蠢欲动，正在和美帝、苏修遥相呼应。帝、修、反想在中国搞颠覆和复辟已不是警惕的问题，而是正在变为现实。报纸上的一篇篇重磅文章，都给大家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广播电台也进行了转播。听到广播，全校立刻沸腾起来。我们班旁边的教室里传出哭声一片，有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种激动的情绪很快在全校蔓延开来。我们班的一些军队的干部子弟也站出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泪俱下，他们也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

北京的学生由于在中央领导机关的身边，行动最快，他们派出先遣队到全国各地去播撒革命火种。北京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消息一下子就在武汉市各学校中传开。我们学校的军队干部子弟也跟着行动起来，他们穿上父辈的黄军装，扎起武装带，十分威风。

到了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十六条》还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坚决地、勇敢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

从上面发表的文件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运动开始时，全国各地学校的斗争矛头对准的都是校长和老师。一位教外语的女老师被他们用胶布封住嘴，胸前挂着牌子，上写“美国特务”，并用红笔划上叉。他们挥舞着皮带，强迫她和另一些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围着操场跑步。谁的步子一慢，皮带就抽到他（她）的身上，还不许他们停下来。教政治的女老师李淑兰（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二中的党总支书记）被他们将头发剃成阴阳头，用字纸篓糊成高帽戴在头上，胸前挂一个大的牌子。学校的校长也成了他们折磨的对象。还有一位教历史的老师受到惊吓，突然一天晚上跑到学校后面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由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后，一夜之间，学校的革干子弟们也都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队伍又逐渐扩大到那些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同学中。剩下的就是我们这

些非劳动人民出身以及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是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的一群，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训斥。

在“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造反歌”歌声中，学校的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越演越烈。

不久，上面宣布学校正式停课闹革命，学校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活动，校园内顿时热闹起来。

首先是老师们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走道里、教学楼外的墙上，到处都挂满了老师揭发学校领导和老师之间互相揭发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从三楼一直拉到一楼，十分壮观。

我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苏利生老师被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肖小兰贴出揭发他的大字报，题目就叫《评苏利生》，马上，苏老师也贴出《谈肖小兰》的大字报进行回击。老师们的互相揭发让我们大开眼界，知道了老师们的一些平时不为人知的隐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位老师揭发另一位好像是负责生物实验室的老师，说他有一次穿着棉大衣在菜场偷猪蹄，把棉衣都弄油了。

不久，学生们也开始对老师进行大字报攻击。并在学校不同教研室的房门两边贴出对联。贴在语文教研组门两边的对联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意在语文老师中有历史问题的人多；贴在理化教研室门两边的是“酸反应、碱反应、运动无反应，初速度、加速度、革命没速度。”就完全是玩套用物理、化学名词的游戏。

接着开始了“破四旧”运动。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对那些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招牌、路牌进行砸毁，换上充满革命意义的新牌子。地主、资本家的家庭被抄家，被认为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被没收，有的就当街堆起来放火烧掉。我们跟着学校的高年级同学一起，到黄浦路附近的古德寺去“破四旧”。他们用很粗的绳子套住寺里的泥塑菩萨，用力拉倒。当菩萨倒地摔成碎块、尘土扬起时，同学中发出一片欢呼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阵线就十分鲜明。

“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特别是革干子弟一个个神气得不得了，成为的学校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根红苗壮、苦大仇深，父辈们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负过伤，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些地方干部家庭的子女，有的人的父母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们在学校也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同届不同班的一位女生的父亲当时是武汉市文化局的局长，革干子弟中的一人把她从同学中点名站起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父亲是三点五到四点零的干部，你要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他们还算客气，给她留了一条出路。平时温文尔雅、娇滴滴的军队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这时也开口一个“老娘”、闭口一个“老娘”地耍起泼来。

而像我这样出身非劳动人民出身，以及那些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同学，不管你过去在学习上或在政治上表现如何优秀，在运动一开始就全部归零了，现在则成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类低人一等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想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都自觉地少说为佳，谨慎做人。

文革前的一次学校汇演时，我们班出了一个节目叫《不忘阶级苦》，就是根据那首有名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歌曲编排的。班上分派我在其中扮演一位贫农老大爷，由另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女同学扮演老大爷的女儿（我这个人天生缺乏文艺细胞，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在舞台上表演节目）。现在也被他们指责为“两个有家庭问题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扮演我们贫下中农？！”简直是义愤填膺。

我们班上的这批革干子弟还算是温和的，除个别人外绝大部分革干子弟没有对老师和同学动过手，最多也仅仅是有人在语言上稍有过火。造反派当权后，别的班上有殴打革干子弟的事情发生，我们班从来没有人这样做，也没有人参加武斗之类的事情。但同学之间原来那种和睦相处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陌生起来。

## 二、大串联

1966年9月，也许是毛主席发现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对准党内走资派，为了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互相学习闹革命的经验，毛主席向全国的学生发出了大串联的号召。

开始，大串联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发给每个班级一定数量专门印制的乘车、乘船票，每张票上都标明了时间和要到达的地点。像我这样出身不太好的人是不敢奢望能有出去串联的机会的。班上现在文革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是朱家平，文革前，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主任，一直是搭档，关系不错。当他将去重庆的船票给了我时，我真是大感意外，我算是有资格比较早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同学，觉得十分荣幸。

我带上被子、洗漱用具等简单的行李和几块钱，乘船前往重庆串联。全国各地均设有接待串联同学的接待站，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都腾出地方给我们吃、住，只要登个记，吃住免费。

到了重庆，接待站安排我到一所学校住下，教室的课桌拼在一起成了我们的临时床铺，每间教室都住得满满登登的。我一安顿好，就跑上大学去抄大字报，到重庆市中心最热闹的解放碑去收集传单，小报，解放碑的大街两旁，揭发批判当时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这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开始成为运动的对象。我还跑到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热情十分高涨。

重庆串联完毕，回到武汉不久，我和周诗僚、谭力嗣同学又得到去成都串联的火车票。这趟火车坐得十分辛苦，火车要过郑州，再过西安，还要翻秦岭，穿山洞，路程漫长而艰辛。沿途还有不少串联的学生要上车，每到一站，站台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大家都背着行李，拼命往车上挤，有的人干脆从车窗往里翻，车厢里人挤得都不能动弹了，连座椅下、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是人。我们整整在火车的狭窄行李架上挤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时，脚肿得连鞋子脱掉后就穿不进去了。

这次我们住在成都体育学院。串联的学生太多，教室都住满了，我们被安排到学校的大礼堂。诺大的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铺盖，就连椅子和椅子之间的狭窄空隙都打上了地铺。

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商量决定当晚步行去大邑县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收租院》泥塑展览。大邑县离成都有七十多公里，我们估计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到达。本来第二天早上是有大卡车送我们到大邑县去的，我们为了表示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态度，决定步行前往。

晚上6点钟左右，我们出发前往大邑县。走出城区，天黑下来，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只剩我们三个人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我拿出口琴，一边吹，一边走。走了几个小时，大家就感到又累又饿，一个个变得无精打采、沉默不语了。

天越来越黑，四周一片静悄悄，通向的前方道路淹没黑暗中，手电筒照在前方只有一道淡黄的光柱，天上的星星是那样遥远，天空显得特别的深邃而神秘，我只觉得天地是那样广阔无垠，那样深不可测，只听到我们三人“嚓、嚓”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野地里回响，不时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深秋的夜晚，一阵阵寒气逼人。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警惕地竖起耳朵注意聆听周围的动静，生怕路边的庄稼地里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往前行走，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我们才看到天边露出了淡淡的一道灰白色，灰白色逐渐扩展，黑色的夜幕一点点消退。慢慢地，灰白色变成淡黄色而金黄色而金红色，天越来越亮，太阳终于露出来了。新的一天到来了，我们悬了一夜的心才放了下来。路上也开始有了行人，我们赶紧上前问路，得知到大邑还有十几公里后，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再也走不动了。这时，后面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原来是送同学们去大邑县的卡车，我们赶快招手上了车。

大邑县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泥塑规模宏大，栩栩如生，确实壮观。但在我脑海里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那一晚的夜路。黑暗中那样的田野，那样的星空，那样的寂静，那样的紧张，那样的疲劳，那样的晨曦……，在记忆中都变得格外的美，格外的难忘。

串联回到学校，校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那一批红卫兵（后来被叫做“三字兵”）由于他们的父辈在运动中开始受到冲击，他们变为了“保爹、保妈”的保守派，并退出了学校这块阵地。社会上，工厂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打倒还是保护省、市委‘当权派’”的问题上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社会上各种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学校也成为“造反派”的天地。各年级的同学中也纷纷建立组织，三两个人也可以拉个队伍，刻个印章，印面旗帜，就可以开张了。我这时才感到自己终于有资格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我先是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组织成立的“挺进兵团”。所谓“兵团”，加上我仅仅只有三个人，每天的任务就是上街卖“井冈山”小报。这份小报是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就是鼎鼎大名的蒯大富。这些小报是我们“挺进兵团”的头头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卖的钱好像也要交给提供小报的某个造反派组织。兵团中的另一位也是高中的同学叫王晏生，他的漫画画得很好，成天在那里不停地画。他将学校的老师们都画成漫画人物加以讽刺，所表现的就是这些老师们如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何只专不红等等。成天卖报纸很无聊，不久，我退出“挺进兵团”，和班上意气相投的十几个男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已算是初四的学生，我们班是三班，就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四零三部队”。女同学们则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的组织，起名叫“红灯照”。

“四零三部队”成立后，上没有领导，下没有基层，就我们十几个人无所事事，整天在学校里玩，有时跟着高年级的大同学们上街贴大字报、刷标语等等，晚上也不回家。

回想这段时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十分无聊的。如：趁着深夜无人，翻墙到隔壁的教师进修学院去偷该校造反组织“红教工”的打字机，第二天，该校“红教工”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强烈抗议、严重警告”的声明；也是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个同学吴懋瑜在黑暗中，躲在三楼教室的窗户旁，吴懋瑜用弹弓向“红教工”亮着灯光的窗户射石子，引来对方的叫骂。我们仍不住手，使对方忍无可忍，向我们这边扔过来一把椅子，把我们这边的一扇窗户砸垮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新鲜感过去了，大家决定再到外地去玩玩。

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上面发出了停止串联的决定。虽然上面不再提倡大串联了，但仍在全国各地跑的学生为数不少。不让免费乘坐车船了，我们就采取扒货车、混票上车等方法自行组织外出。

### 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从1966年8月开始，毛主席已多次接见了红卫兵，为赶上毛主席的接见，1966年11月，我和几个同学在上面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后，扒货车到了北京。

虽然宣布了停止串联，但红卫兵接待站还没有撤销，毛主席仍然还在接见红卫兵。我们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学院住下。现在大家都是串联的“老油条”了，不会像刚开始那样跑到大学去抄大字报，而是到处去看热闹。我们既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去看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大会，也到北海公园去看白塔。那首少儿时就喜欢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曲，使我对北海公园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各地学生之间也经常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甚至动手打架。一次排队吃饭，也是武汉去的一位小个子学生插队，后面一位大个子东北的同学要将他拉出来。当时这位武汉同学手里拿着个灌满开水的热水瓶，他举起热水瓶跳起来向大个子东北同学砸去，大个子一下子满身热气腾腾。幸亏是冬天，没有烫着。其他几个东北的学生冲上去要打他，小个子马上叫起来：“武汉的同学快来帮忙呀！”我们一帮武汉的学生马上围拢过去。由于武汉的学生人多势众，东北的同学立刻闪人。

由于要参加被毛主席的接见，各地来的同学被编成连、排、班，由军人负责管理。11月26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被急促的口哨声叫醒。部队的军人通知我们赶快集合排队，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每人领到两个馒头、一砣咸大头菜、一个熟鸡蛋。队伍集合好立刻就出发了。

天墨黑墨黑的，走了不多时我们就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我们踉踉仓仓地往前一路小跑，只听前面“扑通”一声，立刻有人叫起来：“有人掉进水里了！”队伍一阵骚乱，又听见有军人喊道：“不要乱，继续走！”

清晨5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在我们之前已经到了不少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声鼎沸。天还是黑沉沉的，天边微微露出一点点晨曦，我们问领队的军人这里是哪儿，军人告诉我们是西郊机场。

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发给的干粮也吃光了，毛主席还没有出现，大家都焦急不安。突然听见远处的人群中有人喊：“毛主席来了！”同学们立刻兴奋起来，拼命往前挤、往上跳。后面的同学因为看不见，大声地哭起来。站在前排的全是军人，他们手拉手，一边把同

学们拦住，一边喊：“不要挤！不要挤！”远远看见从飞机跑道开过来一排吉普车，模模糊糊地看到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毛主席穿着军大衣，向两边的人群挥动手臂。车辆开得较快，紧接着一阵吉普车带起的尘土漫卷过来，就什么也看不清了。队伍中只听见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叫和哭泣声，队伍乱作一团。尘土过去，车早已开远了。这时再看同学们，一个个衣冠不整，泪流满面。地上到处都是帽子、书包、鞋子、干粮等。更多的人迫不及待地掏出《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记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虽然没有看清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在红宝书上写下这样的字句：“1966年11月26日某时某分，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后来，我才知道，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那天西郊机场足足容纳了200万人！红卫兵涌上去如海浪一般，将后面的警卫车挤坏了不说，还有两人受伤。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7年4月底，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又跑到北京，这次主要是想观看北京的“五一”焰火晚会。

到了5月1号这天，我们下午3点多钟就往天安门广场赶去。因为听说5点钟天安门广场要戒严，不让人随便进入。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我们发现很多路口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好不容易穿胡同走小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时间已是5点钟左右了，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

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柱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不时还有活动主持人员在宣布会场纪律，布置解放军维持秩序。7点钟左右，天完全黑了下来，广场的路灯、彩灯齐放光明，整个广场亮如白昼。广场上几个发射焰火的地方，解放军战士戴上防毒面具、穿好防护服装，做好了发射准备。这时，高音喇叭中传出活动组织领导的讲话，宣布“五一”庆祝活动开始。只听见广场上及更远的地方，几乎同时响起雷鸣般的礼炮声，同时天空出现了无数耀眼而绚丽的礼花。我们站在离放礼花的地方很近，放礼花的响声把耳朵都快震聋了，火药的烟雾呛得人睁不开眼，爆炸后礼花纸筒的碎屑也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都是。突然，高音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同时传出主持人的讲话声“请解放军同志维持好秩序，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广场看望革命群众！”人群立刻涌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只见几辆吉普车沿着解放军维持好的通道，从人民大会堂方向开过来，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缓缓向天安门方向驶去。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身穿军装，面向周围的人群挥动手臂，后面跟着的几辆车上，分别还有林彪、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都穿着军装，向大家挥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广场。

#### 四、造反派、保守派

文革中，派性林立，各种组织多如牛毛。但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造反派”和“保守派”。

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工人总部”，保守派的最大组织是“百万雄师”。这两大组织后来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两大群众组织。在造反派内部，又分为好多派系，主要有“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三联”（中学红联、公安联司、文艺革联），还有“工造总司”。“三钢”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三新”是大学造反派中较温和的一派，“三联”则是观点倾向于“三新”的势力较小的几个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则是跟“钢工总”摩擦不断的另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造反派

组织在跟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同时，内部也互相攻击，闹得个一塌糊涂。

我们学校的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成为“中学红联”的一部分。到了1967年初，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开始夺省、市委的权，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夺权。为了夺权中的利益分配，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开始了内斗。文革运动现在已经成为大人们的争夺权力的运动，大学生们还有一点能量，学校的高中同学只能跟着起哄，我们这样的初中生连起哄的资格都没有，只有跟着后面看热闹的份。

我们“四零三部队”的成员曾跟着高中同学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到一元路江边的市政府静坐（静坐好像是抗议武汉军区取缔了“工人总部”并抓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洪霞等人），最后静坐演变为绝食斗争。我们绝食了两天还是三天，大家饿得实在撑不住了，绝食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喊：“晕倒了一个！”“又晕倒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连忙赶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组织者通知大家转移到旁边的市人委礼堂继续绝食。在礼堂里，同学们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悲壮，那个凄凉，哭声混合着歌声在礼堂上空回荡。

不久，传来绝食斗争胜利的消息，礼堂内又是一片欢呼。前来支援的工人造反派给我们送来水和食品，“文艺革联”的造反派还到现场慰问，其中有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有人说他就是吴雁泽。可见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了。文艺界的造反派在台上给我们表演了节目。看完演出，吃完东西，我们就各自回家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造反派的集体活动。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逐步由文斗升级到武斗，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显得更正规、更有组织，更有实力。他们头戴一色的藤条安全帽，手拿大刀、长矛，坐着清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像一支经过训练的准军事化组织，传言在“百万雄师”背后有武汉军区的支持，这一点在7·20事件中得到证实。

我两次亲眼看到“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住地的大型武斗场面，一次在汉口最热闹的六渡桥，一次在汉口车站路附近的“工造总司”总部。

六渡桥的武斗是1967年6月17日进行的。当时位于六渡桥民族路口的中南旅社是造反派的一个据点，“百万雄师”这次就是要把这个据点消灭掉。武斗前，“百万雄师”的队伍把通往六渡桥方向的各条道路都堵死了。听到消息我赶到江汉路水塔附近，离六渡桥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围观的群众在马路两边挤得密密麻麻，人群中不断有人叫骂“百万雄师”。只见“百万雄师”中有人拿着长矛就向人群冲过去，人群马上如鸟散状，过一会又聚拢过来。

武斗结束，“百万雄师”的人立马撤退。我跑到六渡桥去看时，只见从中南旅社到铜人像一带房顶上的瓦全部被揭得一干二净，它们被造反派们作为还击“百万雄师”的武器。这样的武器肯定敌不过“百万雄师”的大刀、长矛，被刺死的造反派的一具尸体就躺在离民众乐园不远的马路上，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收拾。一场雨过后，尸体发胀流水，就像充满气的橡皮人躺在那里。

汉口车站路附近的战斗是1967年6月24日，也是六渡桥武斗的一个星期以后。“百万雄师”这次的目的是攻打设在文化局的大楼内的“工造总司”总部。

攻打“工造总司”总部的那天早上，听到消息，我们一帮同学赶到离文化局大楼不远的同学查家铭的家里。这次武斗的方式同上次六渡桥武斗一样，“百万雄师”的人把通往文化



局大楼的各条路口堵死，不让外面的人进去也不让“工造总司”的人有机会逃脱。我们从远处可以见到大楼外的街道上满是头戴藤条帽、手握长矛的“百万雄师”的人在走动。平静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听到大楼顶的高音喇叭中传出“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声，接着就听见一位女广播员急促的声音：“强烈抗议百万雄师围攻我工造总司！”不一会，广播声停止，就看见有人从顶楼窗口纵身跳下。

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快到中午战斗结束，“百万雄师”很快就撤退了。我们赶快下楼跑到“工造总司”的总部里去看，只见院子里、走道上、楼梯旁都有被刺死的人躺在地上，少说也有七、八个人，他们身上戳得到处是伤口，地上还有一滩滩鲜血。

“百万雄师”的每一场战斗都进行得十分干净利落，有章有法。战斗前首先用大卡车把进入的各路口堵死，不让人进入，战斗一结束，立即撤退。

“百万雄师”武斗时的凶残，人们心里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百万雄师”的确是很不得人心的，他们每次游行，几乎都遭到围观群众的唾骂。

又过了近一个月，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起因是“百万雄师”针对当时中央文革派到武汉来处理造反派、保守派矛盾的谢富治、王力等人，认为他们偏袒造反派，“百万雄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次事发地在武昌谢富治、王力等人所住的省委招待所——东湖客舍。汉口这边只看见“百万雄师”的大队人马坐着一辆辆大卡车，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拿大刀、长矛，从7月19日起，连续数天上街游行，高呼：“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等口号。“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据说出动了近千辆大卡车。他们在东湖客舍围攻、殴打、绑架中央文革的代表的情况都是事后从各种报道中得知的，并且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也住在东湖客舍。

“7·20”事件事后被认定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发动的一次针对毛主席的兵变，这样，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

“7·20”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从7月23日早5：30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的重大新闻，并连续20天发表社论，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定性为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几个头头也被抓起来了。

但1968年以后，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几乎全面遭到整肃，保守派又翻过身来。“四人帮”垮台后，造反派的头头们更是大多被判刑关进监狱，而保守派的头头几乎都当了官。

## 五、逍遥派

夺权斗争的反复无常、“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残酷武斗，以及“造反派”内部的互相攻击让我们感到了厌倦。

1967年，武汉军区将“工人总部”取缔，保守派占了上风。学校原来的“三字兵”纠集其他学校的一批革干子弟又杀回学校，见人就打。高年级的一位叫王武军的同学被打死。他们班的同学后来将王武军的遗体埋在学校操场后的土坡上，还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改名为“王武军连”。后来造反派又得势，高年级的同学他们不知从哪儿抓了一个人回来，据说是曾参与打死高中同学王武军的成员之一，在学校内被一顿暴打，打得奄奄一息，用板车拖到161医院门口，扔下就跑了。后来听说这个人死掉了。

在这样的混乱的局面下，我们从学校撤出来，“四零三部队”也自行消亡，大家都成了“逍遥派”。

呆在家里无聊，天气又热，我和同学及邻居小孩们就到处找地方去游泳。武汉的东湖是游泳的好去处，沿湖大学不少，如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工程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工学院等等，每个学院沿湖都有天然游泳池。

从汉口到武昌去游泳，路程实在太远了。为了乘车不花钱，我又发挥了绘画的特长：画乘车学生月票。当时的学生月票的图案实在简单，多是红旗呀、工农兵呀、天安门呀什么的，主色调是大红色，十分好画。只要有一张真月票，我就能“克隆”出一大批来。月票画好后，再用墨水瓶盖当印章，蘸上印泥盖在月票票签边沿上，将月票夹在塑料已经发黄的旧月票夹里就大功告成了。每个月我都要画几十张这样的月票，好多同学和我们宿舍的邻居小孩都用过我画的月票。一个夏天，大家都是用我画的月票乘车，一次也没有被抓住过。

在东湖游泳游得不过瘾了，我们又决定去横渡长江。长江江面的直线距离有1000多米，从武昌中华门到汉口滨江公园的斜线距离有6000多米，中间还要抢过汉水入长江口的激流，抢不好，会被汉水冲到江心，就不可能在滨江公园上岸。

在长江游泳十分刺激，长江水流湍急，轮船一过，波涛起伏，在浪中一上一下的感觉真好。我们几个水性较好、胆子较大的同学只穿一条游泳裤，打伙共用一、两个篮球当救生圈，翻过汉口轮渡码头的江堤外爬上跳板混上船，船快到武昌中华门码头时，我们一个个就从船上往江里跳，再从武昌游回汉口来。一个夏天，我们隔三岔五地用这样的方发横渡长江，从来没有想过会不会有危险，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危险。

最刺激的一次横渡长江是1967年8月2日。

“7·20事件”广播后，我和隔壁的邻居小孩朱伟新、周厚学、黑子四个人又趁机跑到上海玩了几天，8月1号下午才回到家。当我们听到上午武汉市举行了盛大的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不好，从武昌靠近大桥桥墩处下水时因拥挤踩踏淹死了很多人的消息后，我和朱伟新觉得错过了这次活动感到很遗憾，决定第二天早上再补一次横渡长江。

8月2日上午9点钟左右，我们两人就到达了武昌中华门码头。往桥头堡方向走去时，只见长江大桥桥墩旁边的阶梯旁有一大帮人正在忙碌，岸边的堤上摆放着一大排打捞上来的尸体。我们两人从打捞尸体的人群中穿过，从容不迫地走进江水里，向汉口方向游去。

下水后才感到江面上的风浪特别大，天也特别的阴沉。江中几乎看不到有船在开，整个江面显得格外开阔，布满乌云的天空也显得格外的低，就像要压到江面上来似的。

我们困难地向汉口方向游着，一尺来高的乱浪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使我们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浩淼的江面上就只我们两人，真正体会到“极目楚天舒”的感觉。我们加快了速度，奋力向汉口滨江公园方向游去。上岸后，才感到两腿发软，路都走不动了。

这是我横渡长江的历史中最困难、最刺激的一次。

## 六、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停课闹革命”又倒过来变为“复课闹革命”了。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

所谓“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没有什么课可以上，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初中已经毕业的同学，可以不算学校的人了，更没有课可以复。只是把大家都召回到学校，不要再在家里和社会上去混。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很多同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见过面，特别是那些干部子弟们，他们一年多几乎是销声匿迹。大家见了面，都有几分亲热、几分惊喜和几分尴尬。

从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11月的“复课闹革命”，作为初中学生的我所参与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算划了一个句号。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一年多的文革运动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既没有参加揪斗校领导，也没有参加打倒省市委“走资派”的活动，更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我所经历的就是抄看大字报、卖造反派小报、刷刷标语、看看热闹……，再就是扒火车到处去玩、游泳打球偷看禁书……我想大多数中学生都是像我这样度过的，这纯粹是无聊和浪费时间。当然，实际上的文革，跟我这样的中学生经历的文革是不一样的。文革中批斗了那么多人，打死打伤打残了那么多人，摧毁了那么多文物，这些也是有人干出来的。同时停工停产停课给国家和人民带了那么大的灾难。除此以外，我实在看不出文革还有什么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文革的历史千万不能重演！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史海钩沉】

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

• 汪东林 •

“文革”中，红卫兵烧光了梁漱溟所有的古籍字画，同时给了梁漱溟一叠白纸，命令他不许自由行动，老老实实交代一生的反动罪行。但是梁漱溟把这叠白纸用作了其他用途。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记忆，梁漱溟写作了四万字的《儒佛异同论》，接着又写出了《东方学术概观》。就这样，他度过了“文革”最初四年的生活。

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掌管政协的军代表宣布梁漱溟所在的学习组恢复学习，梁漱溟又重新出现在学习组。不久之后，传来了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消息。

这时，军代表宣布，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共文革小组为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笔者：当时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非常害怕，没有一个人敢提意见的，都说这个宪法好，连个错字都提不出来。梁漱溟开始没吭声，到最后了，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其实他早就想好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他说：征求我们的意见，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会，好久不开会

了，咱们一点意见都提不出来，好像我们这个政协委员有个脸面问题，意思就是水平问题。他说，我想我还是要提点意见。大家不知道他提什么，他一提，大家就吓了一跳。

他说我这个人，对这个法，中国的宪法，从民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搞这个了。我看过英国的法，看过好多欧洲的法。这个法，宪法本身产生，它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希望大家都按照这个法来做，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个宪法有欠缺，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拿林彪来说。林彪那个时候并没有出事，在台上，他还并不知道林彪有什么错误。他说总纲上还写着接班人林彪。哎，我声明，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不能有，中国可以有，这个谁要找接班人，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第二条意见，说不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也不好。一国总应该有个元首，我们原来宪法就有国家主席，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没有元首；国家主席还是要，应该要，谁当，谁来当，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完以后啊，当时会场上情绪，鸦雀无声，情绪紧张，你看我，我看你。其中有个委员提出说，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要砸烂狗头的。那个时候时兴这个话。

趁着这次会议军代表不在，学习组的组长、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树德立刻采取了应急措施。

笔者：于树德说，他这个话，他负责。可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现在就烂在肚子里头，出这个门谁也别讲，家里老婆、孩子都别讲。咱们先做这两条，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还赶紧说，我负责，我负责，我既然说了，就是我负责。他就说了这话。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受批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上边有电话通知的，那就是总理办公室的，应该说是周恩来的意思吧。说某某人思想反动，利用这个机会放毒，不要纠缠，不要跟他纠缠。这样，这个事就放下来了。

1971年9月，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法草案也没有再提起。1973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此后不久，《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发全国。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批判的矛头很快指向了梁漱溟。

笔者：因为他是个儒家，所以一开始搞批林批孔的时候，他没吭声。别人说，他一句话也不说。别人问他，他说不是我不说，我一说出来，跟时下这个运动有碍。别人劝他说，你只要批林批孔就好。他一笑，说，我说的是批林批孔这个内容，但是我跟你们说得不一样的。结果大家一定让他说，最后他接受了，他说，好，你让我说，可以，你得给我时间。给多长时间？问问他，他说你给我两个半天时间，我讲。

1974年2月24日，是梁漱溟发言的日子。笔者记得，这一天，梁漱溟显得特别郑重。

笔者：他那天很特别，把自己的中山装穿得笔挺啊，还拿了一个教授的皮包。因为解放以后他没当过教授，这次好不容易当了一回教授。这个印象，这个细节特有意思的，过去从来没有看到他拿个教授的皮包。他讲得很长的，批林批孔这个事情，他说是个政治运动，涉及孔子，涉及克己复礼

梁漱溟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说，台下很安静，没有人打断。我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登过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梁漱溟发言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他在文章的开头说，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荒唐妄为。

笔者：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离开孔子的。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孔子是上承2500年，下启2500年，特别是下启。这样的人物，你说他一无是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梁漱溟如此评价孔子，立刻遭到了质疑。人们追问他对批判林彪的态度。

笔者：我认为像林彪这样的人是没有路线的。这是梁漱溟的话：没有路线的。为什么没有路线呢，因为我对路线有个定义。路线，政治路线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民族的公开主张，这个就不管他是对是错都是路线。毛主席有革命路线，大家都在学，都知道。这是梁漱溟原话。说刘少奇，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这也是路线，他都公开讲的。甚至于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他也是公开主张的啊。说彭德怀有路线都可以，唯独林彪没有。那林彪没有路线，你怎么批林彪，怎么批啊？他说我说几句话，就是我批林彪啊，林彪不是人，是个鬼，这就够了。

如此一来，梁漱溟又多了一个罪名。替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反党分子辩护。政协批判梁漱溟的运动立刻升级，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批林批孔兼批梁”。

笔者：批判嘛，批判力不够，干脆搞大，军代表、统战部和政协军代表组织，搞大，搞成大会，200人大会。大家上台讲，其实内容都差不多，搞了好长好长时间，差不多一年吧。搞完以后呢，梁漱溟也不检讨，让他检讨他也不检讨。他说，完就完。他天天洗耳恭听，你怎么说都可以。他还有一个特点，批判中间一休息，他就打太极拳，你怎么批都可以。？

梁漱溟的太极拳，从春天打到了冬天。局面就一直僵持。

笔者：到了最后，回到学习组，学习组那个时候有二十来人。在学习组中，王芸生、于树德都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搞了这么久，从4月份到9月份，到秋天了，冬天都快到了，对你自己就没点触动，你就没有想想这个事你是怎么考虑？他不说。后来几次问他，他说，我说几句话啊，这个孔子有句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就是我这个志。我就坚信我的理性，我的理性，我是坚信不移的。你们不管谁，没有充分的一种理由说服我之前，我不能改变。

这一场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又不了了之。

1974年9月，毛泽东有过一个批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很多人认为，这个批示，隐含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保护之意。80年代，笔者把这个批示告诉了梁漱溟。梁漱溟听后是一种既严肃又欣慰的神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作者简介：汪东林，1937年12月22日出生于浙江江山，1955年毕业于浙江省江山中学，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服务于全国政协。）

□ 本文摘自《“反面教员”梁漱溟》，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  
【人物追踪】

寻找回来的精神

• 范文发 •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尤其是上海人，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而张、姚长年在中央，“徐老三”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贤。

“文革”前一年，少年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那时的他作派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写过通讯《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轻的一代》、散文《生命如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个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史无前例的“文革”印证了这一点。

一时间，发动者号召人们造反、夺权，上演着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有着很强“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徐景贤，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

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学，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舞动着双手，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最后是举臂高呼：“革命小将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说对不对？”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也就在这时，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已经抹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

一年后，我在寒风昂扬、哭声嘹亮的氛围中，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市领导徐景贤同志、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

正当徐景贤们“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夺权掌权时，我和知青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战天斗地，恰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毫不相干。

后来，审判“四人帮”了，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每晚跑过去看。尽管没几个镜头，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多了满脸晦色。

此后，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

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时，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座位还紧挨着。

这时的徐景贤，佝偻着背，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后来才知道，原1米8的个儿，缩小成1米6几）；走起路来一蹶一拐，是严重关节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满脸堆笑，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声音清晰，思维敏捷。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便随手送给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没话找话而已，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也就过了没两天，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接着问道：“想请教一个问题，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据的是啥？”我说：“是地段，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哦，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像素，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学问人。

最后他谦虚地说：“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

就这样，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对于城市规划、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虽然有共同语言，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18年牢狱的污点。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过多次，均没有登门。徐景贤为人好客，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我推托着没上去。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

因为十年“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

可惜，有资格说清“文革”的，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徐景贤说，他屈指算算，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于是，他反思，他忏悔：他向剧作家、演员认过错；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学生道过歉；他不怕触及禁区，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文革”完整回忆起来，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

这本《十年一梦》，让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读了两遍《十年一梦》。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却让人耳目一新。我开始关注、接近了徐景贤。

十年“文革”，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无不如此。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

确实，徐景贤在“文革”中做过不少“肮脏”的事，但他也曾展现过“高尚”的行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亲朋好友并未“升天”。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云南插队好些年，他也没让调回上海；亲戚中有人想参军，他也不给开后门；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没煤气卫生设施，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

一次闲聊。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幸好人没摔倒。这时，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

也有我亲眼所见的。一次聚餐，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

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待清楚、态度主动，尤其是他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将十分艰巨”，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平稳。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

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帮”的重镇，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判了18年。

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屡屡说起：要不是家庭的温暖，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像的压力，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由他事先开出书目，她就四处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三辆公交车到杨树浦，一月两次从没间断。是解渴的书籍，是亲情的力量，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

是的，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对不住一双女儿。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也是个老资格干部；可现如今受到丈夫的牵连，撸掉了党员，退休也没按离休干部的待遇；女儿们正是中学毕业，父亲的入狱，让她们上大学无望，只能分配到饮食店等最差的岗位；虽然长相俊俏，却无人敢娶。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他的两个女儿才相继成家。他说，当他在监狱里知道两个女儿相继成家了，当他看到了小外甥的照片了，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淋漓。

1990年代，同他一起关押的“四人帮”头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葛蕴芳大着胆子，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后来硬着头皮给邓颖超的秘书写信。

葛蕴芳还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贤家（只是没去张春桥家，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小葛啊，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势利，有同情心。她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几个字。就



是这几个字，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

刑满后，没有单位的他，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关系落在何处？养老金谁来发？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由厂里发放养老金；而徐景贤原来是市委领导，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干部的编制？最后只好落在市政府下属的瑞金宾馆，作为仓库管理员退休领取养老金。一开始只有几百元，后来加到一千元，还是不够开销。他喜欢看书、读报，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分退休金。

为了补贴家用，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家里女儿身体不好，女婿刚辞职还没工作，能不能帮个忙，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我见他确实困难，尽管当时没有把握，但还是一口应承。

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很短时间里就提升到总经理的位置上。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我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那是部长级头衔啊。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现在成了朋友了，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

每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贵贱，上帝都是以一个“生”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个“死”字统统予以收回。干净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下午两点回家，睡了半小时，便在沙发上看书。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任凭妻子大声呼唤，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他没能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

他走了，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

说走就走，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

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十年一梦》只写出了60%的事实，还有40%在肚子里。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他答非所问道：“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他压低了音调，自言自语道：“当年，因为丢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读懂了他的话。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陶渊明坚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眼睛、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一场“文革”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都沉沦了。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

在“文革”的环境里生活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反思？

见证“文革”的徐景贤走了。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文革”。

为了让肮脏的“文革”在中国大地上绝迹，有着高尚传统精神的中华民族：拒绝遗忘！

2012年7月20日

〔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企业管理。〕

□ 来源：《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